

当中国基建遇上非洲热土

■ 曲轩宜



图片来源：荆楚网

非洲大陆的基础设施建设需求空前巨大,这为中资企业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空间。相关数据显示,自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中资企业在非累计参与新建和改造铁路超1万公里、公路近10万公里、桥梁近千座、港口近百个,铺设电力及通信网络超20万公里。这些数字背后反映的是非洲大陆对基础设施的迫切需求、与中国合作的强烈意愿。

尼日利亚的拉各斯轻轨项目是中非基础设施合作的典范之作,包括蓝线、红线和绿线。其中,由中国土木工程集团有限公司承建的蓝线一期工程全长13公里,2023年9月4日正式载客运营,是西非第一条由中国企业自主设计、建造、施工、运营的全产业链电气化城市轻轨,也是非洲第一条跨境铁路。蓝线二期将于2026年建成通车。红线项目一期于2024年2月29日正式通车,该线路全长26.5公里,设8个

车站,公跨铁立交桥4座,全线采用中国技术标准。2025年初,尼日利亚联邦政府财政部和拉各斯州政府签署谅解备忘录,确认将从2025年预算中拨款1461亿奈拉(约合9720万美元)支持拉各斯轻轨绿线的建设,该项目将由中国港湾负责设计、融资、运营和维护。

被誉为尼日利亚“国家新名片”的拉各斯轻轨蓝线和红线项目进一步完善了拉各斯城市路网功能,拓展了城市发展空间,不仅极大地提升拉各斯的城市风貌,巩固其作为西非经济、交通和物流中心的重要地位,更标志着中国技术、中国标准在非洲大陆的深度落地,对于中资企业出海非洲基建也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拉各斯轻轨项目也为中国企业

在非基建提供了新的启示。首先,拉各斯轻轨项目为中国企业提供了新的融资和运营思路。过去,许多由中方主导的非洲大型

基建项目(如亚吉铁路和本格拉铁路)主要依赖中国进出口银行等政策性银行为东道国政府提供主权优惠贷款。拉各斯轻轨项目打破了这一传统模式。拉各斯轻轨项目的融资来源多种多样,包括拉各斯州财政收入、尼日利亚中央银行贷款、尼日利亚联邦政府拨款、公私合资(PPP)以及外国投资和贷款。这一混合融资方式不仅展示了中非基建合作日益增强的灵活性,也标志着中非基建融资正从“一刀切”的主权贷款模式向更加多元化的解决方案的演进。

对中国企业而言,非洲一些拥有相当财政实力和独立发展规划的特大城市或经济发达省份(如尼日利亚的拉各斯州、南非的豪登省)构成了一个潜力巨大的次国家级市场,中国企业可以通过展现与这些地方政府直接合作的能力,有效绕开国家层面的政治复杂性,进入更具商业化导向的项目领域。

其次,非洲绿色基建具有可观的发展前景。拉各斯轻轨蓝线所采用的全电力列车不仅为通勤者提供绿色、环保和节能的出行方式,还有效减少有害气体的排放,得到尼日利亚各界的一致好评。

目前,非洲大陆正积极寻求向绿色、气候适应型的发展路径转型,并得到非洲开发银行、世界银行等国际机构的大力支持。在这一领域,中资企业拥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中国在全球可再生能源技术研发和设备制造占有重要地位,在太阳能光伏板、风力涡轮机等关键产品的全球供应链中占据主导地位。目前,中国企业已深度参与非洲的清洁能源建设,承建了肯尼亚的光伏电站、南非的太阳能项目以及遍布非洲大陆的众多水电站。这种强大的技术和产业能力,使中国企业能够完美匹配非洲日益增长的清洁能源和可持续基础设施建设需求。中国企业可借非洲绿色转型的“东风”,积极参与和推广“绿色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建设,主动从单纯的建设者升格为非洲绿色转型的引领者。

最后,拉各斯轻轨项目为中资企业提供了新的基础设施建设思路。例如,中国企业参与建设的亚吉铁路、蒙内铁路等早期基建项目更侧重于构建连接国家与国家、内陆与港口的宏大“经济走廊”,服务于国家层面的地缘政治和贸易目标。相比之下,拉各斯轻轨项目则标志着中资企业开始深入非洲城市肌理,提供解决城市化进程中具体“痛点”的精细化“解决方案”。

以拉各斯轻轨蓝线为例,该项目为沿线的各类商业活动创造了新的机遇,既包括车站内的小型售货亭,也涵盖大型的多功能综合体开发项目,产生了超过单纯基础设施建设的社会经济效益。中国企业可以借此认识到非洲快速的城市化进程是驱动未来基础设施需求的根本动力,从而将业务重心拓展至价值更高、更贴近民生的城市可持续发展市场。

尽管非洲基建市场机遇广阔,但中资企业也面临诸多需要客观认识和妥善应对的风险与挑战。

首先,中资企业面临着政策与社会风险。部分非洲国家政治生态较为复杂,政策连续性可能因政府更迭受到影响。例如,拉各斯轻轨项目经历了拉各斯州乃至尼日利亚联邦层面的多个执政周期,而政府的更迭也被明确认为是导致项目频繁延期的核心原因之一。对于作为外国承包商的中资企业而言,必须不断适应新的政治领导层及其政策重点,这无疑增加了项目的沟通成本和政治风险。

为此,中资企业有必要建立更为深入和精细化的国别风险评估体系。该体系不仅应包含宏观经济指标,更应涵盖对东道国政治生态的深度研判,以准确评估项目支持的跨党派共识和政策延续性,避免项目因选举或政权更迭而停滞。中资企业还应应对东道国中央政府或地方政府等各级合作伙伴的财政状况进行严格尽职调查,分析其收入来源的稳定性、财政纪律和官僚机构的执行能力。此外,在当地进行合同谈判时,中资企业有必要加入强有力的条款,以应对潜在的工期延误和支付违约风险,明确各方责任和争议解决机制。

其次,资金不足、东道国货币贬值和全球大宗商品价格冲击等经济波动因素可能危及项目的融资和盈利能力。在拉各斯轻轨蓝线项目建设期间,资金短缺导致项目数次延期甚至停滞,直到后来该项目获得外部融资的支持,才为蓝线一期的顺利完工提供了关键助力。同时,货币贬值对于在非中资企业来说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挑战。例如,中国某客车企业于2022年同尼日利亚签订价值300亿奈拉(约6500万美元)的电动巴士订单,然而尼日利亚央行2023年6月实施的汇率自由化改革使奈拉兑美元汇率由460:1暴跌至1300:1,导致合同价值缩水至2300万美元,利润率从15%降

至-7%,对该企业造成了严重经济损失。

因此,在非中资企业有必要摒弃静态的成本估算方法,在项目预算和日常运营上整合极端货币波动、政治风险和安全成本等变量,建立能够应对市场剧烈变化的动态财务应对方案。

最后,随着主要大国间竞争的加剧,非洲的基础设施建设领域已成为一个新的竞技场。中资企业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现在它们不仅需要与商业上的对手竞争,更是在复杂的、充满地缘政治博弈的国际环境中运作。一些西方国家反复强调ESG(环境、社会 and 治理)标准,经常用该标准要求中国企业。它们将某些中国企业实施的项目所产生的问题串联起来,构建了一个“中国投资=环境破坏+社会不公+债务陷阱”的标签化刻板印象。

因此,中资企业可以将ESG从一个被动的风险管理项提升为主动的、创造价值的核心竞争力。通过在ESG领域的卓越表现,不仅可以有效抵御竞争对手的“价值观”攻势,更能赢得当地社会和国际金融机构的信任,从而获得更多优质项目机会。

对于中国企业来说,非洲基础设施发展的宏观环境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个更加复杂、竞争激烈、多极化的新格局已经到来。未来的成功将不再仅仅取决于企业能够调动多少资本,而更多地取决于其战略适应能力。因此,中资企业需要顺势而动,从一个单纯的“建设者”转变为一个能够提供综合解决方案的“可持续发展伙伴”,以完成深刻的“自我进化”。通过坚定地推进这一战略转型,中资企业不仅能够成功应对新时代的挑战,更能够在更加公平和可持续的基础上巩固并深化其在非洲未来发展中的地位,开启中非合作的新篇章。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国际政治经济学院)

有序扩大劳务市场开放 拓展国际经贸合作新空间

■ 吕慎英 梁丹旋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扩大自主开放,有序扩大我国商品市场、服务市场、资本市场等对外开放,扩大对最不发达国家单边开放,这体现了我国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新部署、新要求。劳务市场是要素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有步骤分阶段地扩大劳务市场开放,扩展境内外人员双向交流,将进一步拉近中国与世界的联系纽带,为推动国际经贸合作、服务高质量发展带来新机遇、赢得新发展。

当前,全球经济格局深度调整背景下,劳务市场开放已超越传统人员流动范畴,深度融入产业链供应链重构、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等经贸合作新趋势。随着“一带一路”倡议走深走实,以RCEP为代表的区域自贸协定拓展实施,我国与各国经贸合作正向更深层次、更广领域拓展,劳务市场开放已成为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提升国际经贸合作水平的重要抓手。面对新形势新要求,推进劳务市场开放已从“是否必要”的战略选择,深化为“如何更好推进”的实践命题。

从全球发展趋势看,劳务市场开放是适应新形势下国际经贸合作的必然选择。全球范围内数字经济、绿色经济等新业态不断涌现,对人才的需求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为迫切,各国纷纷通过放宽人才签证、优化居留政策等方式吸引高端人才。我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亟需通过高水平劳务市场开放,参与全球人才资源配置,提高国际分工地位。纵观全球化历史进程,跨境人员流动规模和频率不断上升,这是市场规律和国家政策双重作用下的必然规律。当前我国正处于全面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新阶段,顺势而为推动劳务市场开放,既顺应经济发展内在规律,更有助于促进知识共享、能力共建、创新协同,为构建高水平国际合作体系提供持续动力。

从国内发展需求看,劳务市场开放是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举措。通过劳务市场开放,能够吸引更多高素质劳动力、先进技术、管理经验流入,为新兴产业和高端制造业提供充足的人力资源支持,加快产业创新发展步伐。同时,劳务市场开放有助于促进劳动力要素在更大范围内畅通流动,打破地域分割和行业壁垒,推动人力资源在城乡、区域、行业间高效配置,进一步增强国内大循环的内生动力和可靠性,为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供有力支撑。

从国际经贸合作看,劳务市场开放是深化双边多边经贸关系的重要纽带。在企业出海加速背景下,有序推动高水平高技能人才双向交流,可带动实现各类要素资源在全球的优化配置,更能以国际合作,带动国内标准、技术、装备“走出去”,培育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拓展国际市场和发展空间,实现互利共赢。

当前,在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进程中,我国正以制度型开放为核心,通过多层次、系统性举措积极拓展劳务市场开放新格局,并已取得一系列重要进展。通过对接CPTPP等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我国不断扩大建筑、医疗、工程等领域职业资格互认范围,并为专业人才跨境流动提供制度保障。上海、北京、山东等地率先探索境外人才个人所得税优惠、国际职业资格证书可清单等创新制度,并实施针对55个国家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显著提升了人才往来便利度。通过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国际人才交流大会等国家级平台,有效促进了人才等全球创新要素的集聚融合,为产业升级和国际合作注入新动能。这些探索实践有机衔接、相互促进,共同构成了我国劳务市场开放的系统性框架。

在劳务市场开放向纵深推

进过程中,国内外多重挑战也逐渐显现,制约劳务要素的高效跨境流动。

一是国际规则互认仍存在提升空间。我国与主要经贸伙伴在职业资格标准、行业准入要求等方面尚未形成广泛互认机制,资格认可目录有待进一步扩展,外籍专业人才来华执业仍面临重复认证、流程繁琐等障碍。同时,在跨境社会保障衔接、劳动争议处理等关键环节,尚未建立系统化、标准化工作机制,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跨境人才流动的效率和信心。

二是跨境便利化有待进一步完善。外籍人才在华工作生活期间,在金融服务、医疗保障、子女教育等公共服务领域的体验感和便利度仍有改善空间。如国际人才在开设本地银行账户、办理跨境薪酬汇出等金融业务时,仍面临流程较长、选项有限等不便。对企业而言,人员外派所需的签证和工作许可办理流程仍需进一步优化,特别是商务人员短期跨境往来的便利化程度有待提升。

三是信息共享与人文交流仍需加强。目前劳务供需信息发布渠道相对分散,缺乏整合度高、权威性强的国际化服务平台,导致跨境劳务匹配效率有待提升。同时,语言文化差异、工作习惯不同等软环境因素,也对跨境劳务合作的深度拓展和可持续发展带来一定影响。

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中国将坚定不移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实行高水平的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政策”。要深入贯彻落实这一战略指引,坚持问题导向,聚焦制度型开放,加强系统集成创新,从制度构建、模式创新、服务保障及国际协作等多维度协同发力,不断提升劳务市场开放水平,推动构建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一是完善制度体系。建立健全与国际通行规则相衔接的

劳务市场开放制度体系,制定外籍人才引进管理办法,完善劳务输出管理制度。推动与更多国家签署双边劳务合作协议,重点在签证便利化、职业资格互认、社保衔接等方面作出制度性安排。优化国际商务交流机制,为商务人员提供更加便捷的签证和工作许可服务。依托RCEP框架,率先推动与东盟国家在航运、金融、建筑等专业领域的职业资格互认。

二是创新合作模式。结合国际经贸合作新趋势,积极探索“劳务+投资”“劳务+技术”“劳务+标准”等新型合作模式。在共建“一带一路”项目中,推广“工程承包+劳务合作”“运营维护+人才培养”等模式,实现劳务与产能深度融合。大力发展数字经济平台经济,通过远程办公、在线服务等新形式拓展劳务合作新空间。

三是强化服务保障。积极搭建国际劳务合作平台,一站式提供政策咨询、信息发布、权益保护等服务。完善外籍人才来华工作、生活、子女教育等配套服务措施,营造国际化、法治化、便利化的营商环境。加强劳务人员职业技能及语言培训,提升跨境就业能力。建立劳务市场开放风险评估和预警机制,完善涉外劳务纠纷处理机制,保障劳务人员合法权益。强化部门协同监管,形成监管合力,确保劳务市场开放有序推进。

四是深化国际合作。积极参与国际劳工组织、世界贸易组织等国际组织相关规则制定,推动构建更加公平合理的国际劳务合作秩序。鼓励国内劳务企业“走出去”,参与国际竞争,建立海外服务网络,提供全程跟踪管理。加强与主要经贸伙伴国的政策对话和经验互鉴,共同探索劳务市场开放的新路径、新模式。

(作者单位:山东省商务发展研究院)

国际标准是全球统一的技术规则,是国际贸易的“通行证”,是全球治理的重要技术基础。“十四五”期间,中国国际标准贡献率位居世界前三位,在国际标准舞台上获得了更多国家的认可。

然而,比一项项具体标准被采纳更深刻,也更艰巨的挑战,在于如何实现从技术层面的“标准互认”到理念层面的“价值认同”,这标志着中国标准国际化正步入深化发展的新航道。

过去5年,中国标准与国外标准兼容水平大幅提升。标准体系兼容既是促进产业衔接、技术合作、贸易畅通的重要基础,也对提升中国标准的全球认可度具有积极意义。我国修订《采用国际标准管理办法》,转化先进适用国际标准6900余项,转化率已超过86%。中老铁路、巴西电网、乌兹别克斯坦新能源汽车工厂、赞比亚辣椒和万寿菊种植示范区等一批“一带一路”标志性工程项目成体系应用中国标准,获得了有关国家的认可并进行采用或转化,拓展了中国标准的海外应用范围。

这种“心理认同”的构建,是一场更为复杂的“软实力”考验,其核心在于建立持续的制度性信任。这要求中国的标准化工作必须具备更高的全球视野、透明度和包容性。它意味着我们的标准制定过程需要更加开放,吸纳国际各方的参与和评议;意味着我们的标准技术方案需要更具前瞻性和包容性;更意味着我们需要在国际标准体系中,不仅是贡献技术方案,更要积极参与规则制定,推动国际标准治理体系向着更加公平、公正、包容的方向发展。

中国正在为此进行积极的机制创新与探索。围绕“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十四五”期间,我国与西班牙、斯洛伐克、澳大利亚、老挝等贸易伙伴国新签署标准化合作文件40份。面向东北亚、金砖、东盟、非洲、欧洲,开展了一批标准化合作项目,推动绿色低碳、数字经济、无人机、机器人等领域标准合作走深走实。我国首次在上海合作组织框架下建立标准化合作机制,发布《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加强标准化合作青岛倡议》,助力上合组织成员国在人工智能、低空经济等重点领域加强标准对接和技术合作。

展望未来,中国标准要以更加开放包容的心态,学习借鉴全球先进标准化理念与经验,加快推动中国与国际标准体系更加兼容,让中国标准成为全球先进的代名词。

一是要稳步扩大标准制度型开放。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的广度和深度持续提升,传统的开放模式已不能满足新形势下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要求,迫切需要在规则标准层面加快与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相衔接。这需要我们秉持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精神,在更大范围、更深层次、更高水平上推动中国标准化对外开放,吸纳更多全球先进技术 with 标准提升我国标准的国际化水平。

二是要加快推动标准“软联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是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主要路径,标准“软联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支撑和机制保障。这需要我们搭建“一带一路”标准信息共享平台,为互联互通提供标准支撑;建立标准与技术、产业协同发展机制,以标准引领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促进共建国家标准化人员往来,以标准交流互鉴增进民心相通。

三是要推动标准化国际合作实现共享共赢。实现共同发展是标准化合作的愿景,这需要在标准化国际合作中积极寻求各方利益交汇点,对接各方发展需求,回应人民现实诉求,实现各方共享发展机遇和成果。要推动国际标准组织更多倾听发展中国家的声音,让国际标准以及包括中国在内的更多国家先进标准成为服务全球发展的有力工具。

中国标准走向世界的过程,是中国与世界深度互动、共享发展的过程。从“标准互认”到“价值认同”,是一场考验定力、智慧和胸怀的“马拉松”。它要求我们不仅做国际标准的卓越贡献者,更要做开放合作的坚定维护者、共同发展的积极推动者。唯有如此,中国标准才能真正成为一座坚固可靠的“软基建”之桥,连接中国与世界,助力构建开放包容、互利共赢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作者为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标准创新司一级调研员;来源:人民日报海外版)

推动从『标准互认』迈向『价值认同』

■ 李东方